

第一章

险 中 险

1

暗号对上了，他明白眼前这位精明、干练的年轻人便是周恩来安插在白崇禧身边的谢和赓。听了汇报，他禁不住抱着谢和赓的双肩摇着：“年轻人，好样的，干得漂亮！”

1938年，武汉。

经过了一场酷热熬煎的武汉人，来不及喘口气，又一场灭顶之灾向他们扑来：中央军打不过小日本，接连吃败仗，武汉，怕是要沦陷了！

逃生，成了人们的第一需要，素有“要地”之称的武汉，到处人喧马嘶，一片狼籍。

情况的确严重，武汉外围的天险、要塞纷纷陷落，日本侵略军华中方面军第 3 师团、第 10 师团，外加一个骑兵旅团已攻占应山，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向武汉侧后西北方向的安陆。

武汉的正面，情况更糟，宋埠被日军从东向西扑过的 13 师团攻克，麻城被 16 师团攻陷，踏平稻叶的日军第 6 师团已进窥距武汉三镇不到 15 公里的黄陂。

武汉的南翼，日军早已截断了粤汉线，日军的第 9 师团、第 27 师团直插贺胜桥，日波田支队在第三舰队的支援下，进逼武昌城下。

武汉三镇为之震动，武汉，成了一块死地。

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设在日租界大石洋行内。即使是日租界，也是那样的躁动不安。

一间房内，身为长江局秘书长的李克农正与国防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在商谈撤退之事。经受过无数次风险的周恩来、李克农此刻也被一派紧张的氛围包裹着，他们的交谈是那般的严肃。

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准备放弃武汉，在原来设立的几大战区的基础上，再设立两个军事指挥机关，即西北行营与西南行营，以便指挥各战区作战。

西北行营设在西安，主任由程潜担任。

西南行营设在桂林，主任由桂系头目之一的“小诸葛”白崇禧担任。

蒋介石自己，则退到重庆。

根据形势的变化，设在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撤消，其人员一部随周恩来去重庆，一部随李克农去桂林。

“克农同志，这次你去桂林，不仅仅是撤退问题，还有个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问题，你肩上的担子不轻啊！”周恩来以他那夹带方言的普通话和特有的谈话方式，对李克农道。

李克农说：“办事处……白崇禧能答应？”

周恩来回道：“我想白崇禧会答应的。”

李克农摘下眼镜，不紧不慢地擦着，静等周恩来的下文。他明白，周恩来从来不说半句话，分析问题也好，交待事情也好，他总是讲得那般细致，分析得那般透彻。

果然，周恩来边拾掇桌上的文件，边顺着思路往下讲：

“桂系一向存有倒蒋之心，现在，日本鬼子打到了长江边上，白崇禧不会不明白这是一个好机会。为了保住广西这块地盘，扩弃实力，桂系故作高姿态，一方面力主抗战，收买人心，一方面招贤纳士，扩军备战，加上台儿庄大捷，李宗仁、白崇禧大大地露了一回脸……克农，也许你在桂林的日子会比重庆好过。”

李克农戴上眼镜，望着周恩来那双深邃的眼睛，释然地笑了。

周恩来立刻敛起浓眉，道：“你别笑得也太早，到了桂林，千万别放松警惕，反动派终归是反动派，他们翻脸不认人的！”

李克农不住地点头，他不得不敬佩周恩来的敏锐。早在20年代，在上海，他就随周恩来做党的秘密工作，从周恩来的身上，他学到了不少东西。

二人就撤退的路线，该携带的物资，人员分工等作了详细的部署。李克农准备告辞，又被周恩来叫住了：“今天晚上你得去会一个人！”

“谁？”

“到时候你就清楚了。”

周恩来将接头的地点、联络暗号等一一作了交待，最后说：“这个人的组织关系往后就转到你那儿，直接接受你的领导，与你单独联系。”

李克农愣了一下，心里明白，这个人一定不是等闲之辈，

一定是周恩来亲自安插在某个重要位置的重要角色。

夜幕封住了长江，本该是生机勃勃的江水倒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不停地叹息着。夜幕包裹中的龟山与蛇山，宛如一幅拙劣的剪纸。

李克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将自己扮成一位商人，在江边静静地等待着。江边一处回水的柳丛中，有一条带篷的渔船。

李克农出生在辛亥革命即将发生的烽烟翻滚、英雄辈出的年代，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北洋政府，国民党……明争暗斗，把个本不平静的世界闹得沸沸扬扬。

这些事件，在李克农这位“巢湖学子”的心灵上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11年，广州起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气贯长虹。也就是这一年，被中国人拜了几千年的皇帝被赶下了台，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不甘寂寞的袁世凯与孙大总统分庭抗礼，中国出现了南孙北袁的局面。

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当上了“洪宪皇帝”，孙中山出走日本，在日本发表《讨袁宣言》。

1919年5月4日，爆发了学生爱国运动。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

这期间，还有数不清的军阀混战，地方暴动，武装割据以及占山为王之类的事件发生。

动荡的岁月，给李克农以磨难，也给了他锻炼与成长的机会，更给了他选择的机会。

人生就是选择！在各种政治团体争相显露峥嵘，各色旗

帜到处飘扬时，李克农毫不动摇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

一阵凉风从江面扑来，打断了李克农的回忆，他禁不住咳嗽起来。他的肺部曾穿孔，一遇天气变化或劳累过度，总少不了咳嗽。

突然，他觉得有个人向他走来，尽管他的一只眼睛已没有了视力，凭借着剩下的一只眼睛，他还是判断出走来的是一身学生装的年轻人。

走到他面前的果然是一位二十好几岁的年轻人，一身学生装束，鼻梁上，也架着一副眼镜，秀气中透出几分英武。

“你是王老板？”年轻人有几分恭敬地问。

“不，我姓李，十八子！”

“去西北经商？”

“不想去南方做生意。”

“还要不要伙计？”

“生意好做，伙计难找啊！”

年轻人十分激动地握住李克农的手，说：“同志，又找到你了！”

“你是……”

年轻人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举目四下里搜索，显出十二分的机警。

单凭这一点，李克农便觉得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不简单，是块好料子。于是说道：“那儿有条船，是特地备下的，我们到船上说吧。”

年轻人随李克农上船，船上除了两个小板凳、一只茶壶外，什么也没有。李克农用撑篙将船撑离岸边约三丈开外的隐蔽处，定好船，转身进篷与年轻人相见。

年轻人不待李克农开口，自我介绍道：“我叫谢和赓，白

崇禧的机要秘书，是周副部长指派我在那儿工作的。”

这下轮到李克农激动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竟然是自己的同志，怎么不令他这即将去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当处长的人激动呢！机要秘书，多么重要的岗位啊！

“你的大名我早知道了，但没想到你也是共产党。我叫李克农……”李克农简单地向对方作了介绍。

“哎呀，秘书长同志，您的大名真可以说是如雷贯耳。您在西北与东北军打交道那阵儿，我就听说您了，只是无缘相见，没想到今日……”

李克农说：“你能钻到‘小诸葛’的身边，而且取得他的信任，不容易啊！”

谢和赓取过茶杯，给李克农倒了一杯茶，又给自己倒了一杯，道：“此事说容易也容易，说不容易又不容易。”谢和赓品着茶，谈起他在白崇禧身边工作的情况。

谢和赓，出生在广西一个诗书世家，其父亲是文化人，擅长书法，是大画家徐悲鸿的好友。1933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受党的指派参加冯玉祥的西北军，接受宣侠父的领导。这位青年大学生只当了三天三等兵，便担任吉鸿昌抗日同盟军第五师教导队教员。第五师师长便是宣侠父。

吉鸿昌的队伍失败后，党组织指派宣侠父和谢和赓到广西，做桂系上层的统战工作。

谢和赓回广西，党组织有三点指示：

- 一、站稳脚跟，研究桂系上层军政情况。
- 二、设法争取接近李、白，取得他们的信任。
- 三、秘密发动全国抗日宣传鼓动工作。

谢和赓只与宣侠父单线联系，谁也不知道他真实的政治面目。

谢和赓是拿着冯玉祥的介绍信到广西的。他直接见白崇禧，递交了冯玉祥的亲笔信。与此同时，白崇禧和李宗仁还接到了李济深先生写给二位的推荐信，信中对谢和赓不乏夸赞，建议李宗仁、白崇禧“楚才楚用”，“量才使用”。

是因为谢和赓是同乡？

是因为冯玉祥、李济深的信？

是因为谢和赓一表人才？

还是因为……

白崇禧留下了谢和赓。

谢和赓了解到，白崇禧有个特点，爱读书，爱搞点论著，爱惜好学上进的年轻人，讨厌经商、爱财的年轻人。他明白，凭着冯玉祥、李济深的推荐来到了白崇禧的身边，这一步已是相当不容易了，但要站稳脚跟，还得靠日后自己努力。

就从论文开始吧！当时的局面有如春秋战国，大有百家争鸣之势。

经过一番努力，谢和赓写出了《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概观》一书。为了讨好白崇禧，该书以他和他的同学、白崇禧的内弟马仲孚二人署名合著，由他父亲题写书名，由白崇禧信得过的高参刘斐作序。

此书一出，产生了轰动效应，谢和赓“才子”的形象初步树立，白崇禧很自然地注意到他了。

谢和赓不负众望，接着又写出了《论美国倾销政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谈广西对外贸易》等论文。这些论文写好后，都拿给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征求意见，请他们斧正。

这些论文恰好符合广西当时制订的“三自”（自治、自卫、自给）政策，于是谢和赓开始受到广西上层领导人的青睐。

1934年冬，谢和赓任广西工商局研究员，建设厅工商科

一等科员，受命起草《广西省营商品联营处章程》，开始受到重用。

谢和赓到广西才 4 个多月，便取得了一张五路军总部颁发的只有少将以上军官才享有的特别出入证。凭这张出入证，谢和赓可以随便出入李宗仁、白崇禧的住处。

这期间，谢和赓组织关系上的直接领导人宣侠父受任为广西绥署上校参议。他们两人相见的机会多了，不过，为了掩人耳目，他们见面时，总拉上白崇禧的侄子白维义。这样，白维义便成了他们的保护伞。

谢和赓尽管处境不错，但还没有办法长期呆在白崇禧身边，许多机密情报无法弄到手。谢和赓在苦苦思索，在不停地寻找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白崇禧的岳父马健卿在邕城不慎摔了一跤，造成骨折。

马老爷子最相信桂林的名医熊同和。于是，为了赶时间，谢和赓冒险坐上了广西自制的练习飞机，从桂林请去了熊同和。

白崇禧得知此事后，奖励 200 元给谢和赓以示酬谢，但谢和赓高低不要。实在推不掉了，谢和赓只取了 50 元。

白崇禧从不把亲属安排在诸如财税部门工作，也不主张年轻人利用公款或军用运输工具做生意，一个人爱不爱财，成了他考察下属的一条标准。

谢和赓不惧死，不爱钱财，使得白崇禧对他刮目相看了。

渐渐地，谢和赓窥探到桂系有“倒蒋”之心，并积极做“倒蒋”的准备，于是，趁机递上了一个报告。

报告中，他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指责蒋介石放着日本人不打而排斥异己的行为，建议广西打出抗日的旗号以收取

民心，凡反蒋抗日的军政人员来广西都欢迎。报告中，特别提到了在黄埔军校呆过的学生，上海的救国会知名人士，福建的十九路军以及文武双全的宣侠父。

这份报告引起了李宗仁、白崇禧的高度重视，可以说这份报告为桂系“六·一”倒蒋行动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也为谢和赓靠近白崇禧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

三国时人李康说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谢和赓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一些人的嫉妒，于是，有人造谣，有人告黑状，说他拥护白崇禧而反对李宗仁。

“三人成虎”，实在有些可怕！一次，李宗仁召集民团干校师生训话，说着说着激动起来，点着名骂谢和赓是共产党，是“土共”。指责谢和赓“以局部抗战推动全面抗战”是错误的，在学生军中搞什么“斯派”、“托派”更是错误的。他眼里没有我这个广西的最高领袖……

到了这种地步，连白崇禧也有些为难了，他一面告诫谢和赓注意点，千万别得罪李的人，另一方面，他极力找李宗仁为谢和赓辩解。

这场风波真正结束，是由于谢和赓力排众议，投出的一张反对票。

“六·一”风暴后不久，有人向白崇禧建议，把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撤了，省主席一职由白手下的军长夏威担任。同时，换掉李宗仁的亲信参谋长张任民和财政厅厅长黄宗岳。照这般做，整个广西军、政、财大权都掌握在白崇禧的手上了。

谢和赓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找到白崇禧，指出提这种建议的人名义上是为白扩大势力，实则是在搞垮桂系。因为李、白、黄像三国时的刘、关、张，决不能分开，否则，恰好中

了别人的计，将统一的广西分化，各个击破。

白崇禧夸谢和赓有眼力，并把此详细向李宗仁作了报告。从此，李宗仁消除了对谢和赓的误解，相信白和谢对自己都是忠实的。

像上述这样力排众议的反对票，谢和赓还“投”过两次。

一次也是“六·一”事件后不久，蒋介石邀白崇禧赴广州会晤，共商大计。

白崇禧有些动心了，准备赴粤。

谢和赓认为，这次白赴粤是蒋介石分化广西，调虎离山之计，白崇禧一旦离开广西，其后果不堪设想。

谢和赓一面向白崇禧力陈利害，一面通过白维义怂恿白夫人从中阻拦。由于谢和赓的操纵，终于演出了白夫人向李宗仁哭诉由衷，大闹司令部的一幕，从而阻止了白崇禧赴粤。

另一次是卢沟桥事件发生后，蒋介石电召李宗仁、白崇禧到庐山和南京会晤，商讨抗日大计。

当时，不少人反对李、白赴约，说蒋介石是个阴险小人，去了恐有不测。

谢和赓又一次投了反对票，力劝白崇禧成行。他认为，眼下全民抗战的局势已形成，共产党抗战的主张深得人心，蒋介石不可能在这个时候背道而驰，忤民心而不顾；再说，日本侵华来势很猛，美国、英国这些国家也会因为他们在华的利益，促使蒋介石抗日。蒋介石决不敢在这个时候下毒手。

这一番分析，合情合理，深得白崇禧赏识，白崇禧决定赴南京。白崇禧让侄儿白维义告诉谢和赓，这次南京之行，决定带谢为秘书。

听到这个消息，谢和赓的心狂跳不已，几乎一夜没有成眠。看来，他可以完成党组织交给他的“接近李、白”的任

务了。

从赴南京之日起，谢和赓便成了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了。

白崇禧身边有两个机要秘书，除谢和赓外，另一个是黄启汉。但黄启汉的位置远没有谢和赓重要，他只是记录白崇禧的言行，一句话：为白崇禧记日记。

谢和赓则不一样，他要为白崇禧处理各种事务，判断各种情况。谢和赓，是白崇禧的半个脑袋和一只胳膊。

听了谢和赓一席谈，李克农禁不住抱着谢和赓的双肩摇着，激动地说：“年轻人，好样的，干得漂亮！”

谢和赓则有些难为情地低下了头，呐呐道：“往后，还请组织上严格要求我，考验我。请秘书长多指导、批评。”

李克农爽朗地一笑：“很好，站稳了脚跟，取得了信任，很好呀！不过，千万不能大意，更不能骄傲。我们时时刻刻都要记住我们是提着头干事的，稍有疏忽，头就会搬家呀！”

谢和赓表情严肃，不住地点头。

李克农思索一阵儿又说：“宣侠父去了大西北，你的组织关系由我接管，往后有什么打算？”

谢和赓想也不想地道：“见机行事吧！只要党组织交给我什么任务，我一定努力完成。”

李克农说：“具体事情不会惊动你，你的主要任务和以前一样，做桂系的上层工作，只要桂系坚持团结抗日就行。”

突然，李克农觉得有什么声音，示意谢和赓别再说话。谢和赓倏地拔出了手枪，但被李克农制止了。

响声越来越大，似乎是摇橹的声音。借着夜色，李克农悄悄向外窥探。果然，一叶小舟箭一样地划过来。

李克农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小船，谢和赓不得不佩服李克农的机警和沉着。

小船上坐有三个人，还有好些东西，在他们不远处稍停片刻，似乎在观察什么，尔后，又箭一样地向前划去。

李克农与谢和赓相视而笑，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对于桂系，我们总的宣传方针是：只有实现全国抗战，桂系才能打出广西，伸入蒋管辖的腐败的省区。同时扩充势力，提高李、白的威望，使李、白成为民族英雄。”谢和赓说。

李克农接下话头：“对李、白最有吸引力的，是问鼎中原，与蒋介石争地盘，争天下。在白身边，多出这方面的点子，将他们争天下的野心变为抗日的信心。”

谢和赓点头。

轰 轰 几枚炸弹击中船头 机枪也响了。李克农
2 眼睁睁地望着“新升降”慢慢下沉。乖乖 若是耳
朵不灵敏 早几分钟上船 此刻……

武汉撤退是紧张而有秩序的。

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人员，还有国民政府政治部第三厅的部分人员，在武汉握手道别，有的去重庆，有的南下桂林。

撤退的时间是 1938 年 10 月初。

撤退前，叶剑英先派出刘恕等到桂林打前站，利用熊子民的关系，到桂林找房子，办理一应事务，以便人员撤到桂林后，马上开展工作。

对于开设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李克农是有经验的。他先后在西安、南京、武汉都干过办事处工作。可以说他去桂林开设办事处是轻车熟路了。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确立了组织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

当时，围剿陕北根据地的国民党军队大部分是东北军。

东北军虽听蒋介石指挥围剿红军，但有毁家之苦，失地之恨，有可能争取抗日，于是，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主任，李克农担任周恩来的助手。后来，中央决定成立联络局，李克农担任局长，对外称“苏维埃政府外交部长”，而实际工作，还是团结东北军抗日。

李克农的工作，是从一批被俘的东北军将士开始的。

这批战俘，都是中下级军官和士兵，做好了他们的工作，再放回去，东北军中便有了一批“种子”。

瓦窑堡，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培训班——“解放军官培训班。”在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被俘的120名东北军中下级军官，参加了培训班的学习。

“四面楚歌”，这个成语没有人不清楚，在这个学习班里，则到处是东北音。

枪口对外，停止内战！

打回老家去！

标语、口号、歌声，动人心弦。

这些战场上的铮铮铁汉，此刻，一个个成了泪人！

五年了，回想起来，像一场梦，一场噩梦！东北丢了，家园毁了，谁干的？日本鬼子！而他们却背井离乡，跟着少帅，不是报仇雪恨，而是专打自己的同胞。

道理再浅显不过了，一点就明。

李克农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训练班达到了预期的效果，120名军官自发地成立了抗日同盟会，其中不少人还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

俘虏军官中，有个叫高福源的人，李克农列入重点，亲自找他个别谈话。

高福源原是东北军 67 军 107 师 619 团团长，在 1935 年 10 月 25 日的榆林桥战役中被俘。李克农经过观察，发现高有正义感，性格直爽，加上亡家失土之恨，因此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抗日情绪高涨。

李克农对高福源区别对待。当时天气很冷，他没有棉衣，李克农找来棉衣，找卫生员给他治伤，伙食上，他比红军吃得还好。

经过李克农的多次谈话，高福源思想通了，表示回去亲自找张学良，劝张学良停止内战，使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

当时，李克农担心高福源回去后的安全，谁知高福源胸脯一拍说：只要张学良能与红军联合抗日，命丢了也值！

高福源没有食言，走一路，便宣传一路，讲红军的主张如何好，红军是东北军“打回老家去”的好朋友，东北军只有与红军联合抗日，才能报国恨家仇。

在洛川，张学良接见了高福源。

会见是在 67 军军部进行的，参加的还有军长王以哲。张学良这次是亲自驾飞机来洛川的。

高福源的确算得上是一条汉子，在张学良、王以哲的面前，在剑拔弩张的氛围中，居然镇定自若。

“报告副司令，我回来了，是红军派我回来的，有重要情况向副司令报告！”

高福源先讲红军的主张，再回顾东北军的历史，揭露日本侵略军的罪行，指出东北军的前途和出路……高福源声情并茂，涕泪泗零，在场的人全被感动了，张学良的眼圈也红了。

高福源句句话都戳到张学良的心尖上。杀父之仇，毁家之恨，“不抵抗将军”的罪责，一齐涌上心头。他不但没有治高福源的罪，还将高福源留下来，与王以哲三个人一起谈了一个通宵，商谈与红军联合抗日之事。

高福源的这番阔论，是李克农教给他的。高福源的成功，显出了李克农高超的领导艺术。

1936 年 1 月 16 日，高福源回到陕北苏区，向李克农复命，汇报了他回东北军的经过。

李克农第二天便带高福源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

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李克农为正式代表，赴洛川与张学良谈判。

1936 年 2 月 21 日，李克农一行身着便装，骑着快马，由高福源引路，直赴陕北名城洛川。这时的高福源，已是共产党的一员了。

25 日，李克农到达洛川，受到了王以哲军长、赵镇藩参谋长的热情接待。

在谈判的日子里，张学良没有出现，但李克农与王以哲达成了如下口头协议：

1. 为巩固红军与 67 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之原则（包括 67 军在陕甘边区及关中区之防地）。

2. 红军同意恢复 67 军在邠县、甘泉、延安公路上之交通运输及经济通商。

3. 延安、甘泉两城现驻 67 军部队所需粮柴等物，可向当地苏区群众购买。红军为便利延安、甘泉友军起见，准转饬当地苏维埃发动群众运送粮柴等物进城，恢复寻常关系。

4. 红军同意在甘泉被围的 67 军两个营重新换防，不加阻挠。

5. 恢复红区和白区的通商，红军采办货物经过洛川、郾县等地，67 军有保护之责；67 军人苏区办货，红军有保护之责。但为暂时掩外人耳目计，红军去白区办货时可着便衣。

短短的时间内就达成了如上协议，李克农有些兴奋。

1936 年 3 月 3 日，张学良从南京飞西安，第二天便在洛川会见了李克农。

张学良身着中式便装，鼻架浅色墨镜，手拄文明棍，若是不知底细的人，谁能知道他是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说不定猜他是个阔老板呢。

李克农一贯说话风趣，就顺着这个印象，打趣道：“张将军，你在什么地方发财呀？”

张学良仰头一笑，随口道：“我从来不做小生意，做的总是大买卖。”

“大买卖？”李克农的心怦然一动，道：“是零售呢，还是整销？”

“整销！”

“整销最好！痛快！”

二人相视大笑。未曾谈判，已是谈判，气氛十分融洽。

谈判进行了一天一夜，双方谈得非常好。谈判的内容除了上述几条口头协议外，还有联合抗日的问题。

关于抗日问题，有大有小，有对待蒋介石的问题，有联络苏联以求援助问题。

谈判中也有争论，主要围绕是联蒋抗日，还是反蒋抗日。

张学良主张拥蒋抗日。李克农了解张学良与蒋介石是拜把兄弟的关系，明白在短时间内说服张学良是不可能的，弄不好反而把事情搞砸，于是，避开一些敏感的问题不谈，只谈一些具体问题，这样，气氛又缓和下来，终于达成了四项

协议。

一、请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面晤，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

二、我方派一名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掩护，以便推动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组成。

三、红军和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由张学良与新疆的盛世才联系。

四、这次会谈不登报，不外传，只在双方部队秘密实施。

李克农返回，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夸道：“搞得不错，很有成绩。”

不久，李克农随周恩来，赴东北军中与张学良谈判，使张学良抗日的态度进一步明朗。当然，共产党方面，也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联蒋抗日”，改变了态度。

“西安事变”发生后，李克农随周恩来赴西安，和平解决了这次事变，推动蒋介石抗日。

从优待东北军俘虏到“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克农实际上当上了中共的代表，在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事件中，充分显示了他的智慧和才干。

西安——南京——武汉，李克农干得非常出色，下一站：桂林。桂林会怎么样呢？

“新升降”启动了，马达声召唤着撤退的人们。一捆一捆的白纸抬上了船，箱笼、包裹等一件一件也抬上了船，不少人也开始登船了。

《新华日报》社的总编辑潘梓年已经在呼喊了：“秘书长，还磨蹭什么，上船啊！”

李克农没有回话，只是扬扬手，表示听到了，并表明马上就来。